

# 气候外交话语中的隐喻和身份构建

——以英国、加拿大、中国在历次气候大会上的发言为例\*

翁青青

**内容提要：**在气候问题上，英国、加拿大和中国在一定程度上分别代表了欧盟、伞形集团和发展中国家的谈判立场。文章通过语料库方法，结合批评隐喻分析，定量探讨了英、加、中三方在历次气候大会发言中的隐喻使用差别，分析了各方如何在隐喻中通过意识形态方阵构建“自我—他者”身份。文章认为，政治立场影响了英、加、中三国隐喻的选择和使用，三国在身份构建中体现了不同的“自我—他者”定位，并服务于所属团体的利益。文章还提出“隐喻—身份构建—政治立场”的互动框架，认为这三者是一种动态的互动关系，为国际关系的语言学视角研究提供了借鉴。

**关键词：**外交话语 身份构建 批评隐喻分析 意识形态方阵 语料库

**作者简介：**翁青青，复旦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硕士研究生

## 一、引言

随着全球气候危机的加剧，气候问题成为国家和国际社会之间博弈的新焦点，气候外交随之兴起。该问题对国家的身份构建具有重大意义，能为各国（特别是大国）寻求优势领域、建立或重拾国际关系话语权提供契机。以欧盟为例，其积极参与气候斡旋的大部分原因是为其外部和内部的认同进行战略建构：一方面，欧盟力图在国际气候博弈中顺势掌握气候政治的话语权，制定气候规则的主导权并复兴全球领导者的地位；另一方面，由于其积

---

\* 感谢《当代亚太》匿名评审专家对本文提出的宝贵修改意见。

极的气候立场得到广大公众的接受和广泛支持，这种领导作用的凸显也加强了欧盟内部的认同，从而推动欧盟一体化进程。<sup>①</sup>

“现代社会权力的运作越来越多地通过意识形态，尤其是通过语言的意识形态功能来实现。”<sup>②</sup> 在语言如何建构现实方面，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约翰·奥斯汀(John Langshaw Austin)、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和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等都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探讨。语言的政治性、权力性和建构性影响着人们对国际政治“现实”的理解，因而一定程度上也影响着国际政治的进程与结果。为了建立、维护和加强合法性，国家经常要使用一些言辞技巧来支撑自己的意义体系，<sup>③</sup> 相关策略包括谨慎地操纵媒体、巧妙框定话语内容、战略性地选择词汇等，从而引导人们对政治事件和行动的感知和理解。<sup>④</sup> 在这方面，隐喻可谓是一种有效的表达方式：一方面，“政治世界是复杂而充满价值观的，无论在认知上还是感觉上都远离人们即刻的日常经验”，<sup>⑤</sup> 所以，隐喻就成为各国政要化抽象为具体、梳理政治现状和表达政治理念的最佳选择；另一方面，隐喻作为一种话语战略，可以影响人们的思维，重塑人们的态度，甚至帮助重组现实，因此也被认为是“政治行动的许可证”。<sup>⑥</sup>

自1992年气候谈判启动以来，历届气候大会都上演着各国对经济利益和发展空间的角逐。与此同时，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格局却发生了变化：发达国家历史排放量多，当前和未来排放量呈下降趋势；发展中国家历史排放量少，当前和未来呈增加趋势。这导致了两大阵营在谁先减排、减排多少、如何减排等问题上出现了分歧。问题的复杂性还在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并非双

① 李慧明：《当代西方学术界对欧盟国际气候谈判立场的研究综述》，载《欧洲研究》2010年第6期，第74~88页；谢来辉：《为什么欧盟积极领导应对气候变化》，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年第8期，第72~91页。

② Norman Fairclough, *Language and Power*, New York: Longman Group UK Limited, 1989, p. 2.

③ Frank Schimmelfennig, *The EU, NATO and the Integration of Europe: Rules and Rhetoric*,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 207-208.

④ 孙吉胜：《国际关系理论中的语言研究：回顾与展望》，载《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2009年第1期，第73页。

⑤ Suzanne C. Thompson, “Politics without Metaphor is Like a Fish without Water”, in Jeffery Scott Mio and Albert N. Katz, eds., *Metaphor: Implications and Applications*, Mahwah, N. J.: Erlbaum, 1996, p. 185.

⑥ 贺梦依：《概念隐喻与政治的关系识解》，载《外国语文》2011年第3期，第49页。

边博弈，气候利益接近的国家通过抱团来增强谈判的实力，争取更大话语权”。<sup>①</sup> 气候大会上，各国都使用了大量的隐喻作为其政策合法化的语言策略，把国际规范重新阐释为对攸关国家利益的损害，转移问题焦点，从而成功挑战国际规范的合法性。<sup>②</sup> 伞形集团（Umbrella Group）、欧盟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博弈尤为明显。伞形集团包括欧盟之外的大多数发达国家（美国、加拿大、日本等），因其国土在世界地图上的分布成“伞形”而得名，其谈判立场较为强硬。相比之下，欧盟的立场较为积极，发展中国家则强调“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本文选取英国、加拿大、中国分别作为欧盟、伞形集团、发展中国家的典型代表，旨在研究以上三方对隐喻的选择和使用有何差别，其对各自的身份构建有何影响；隐喻、身份构建和政治立场这三者之间的关系等。

## 二、文献梳理和假设

20世纪80年代末，随着语言学被引入国际关系学，国际关系研究出现了语言学转向，“它既超越了侧重从硬实力方面考察国际关系的物质视角，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一般文化视角对权力概念关注不够的缺陷”，<sup>③</sup> 为相关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孙吉胜指出，国际关系的语言转向研究主要集中在后建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前者强调语言的规范性对社会事实的建构，而后者更注重对国际关系文本的解构。<sup>④</sup> 近年来，相关研究日益增多，但有关语言、身份和政治立场互动方面的探讨并不多见，<sup>⑤</sup> 且以理论剖析为主，主要探讨国际关系研究语言视角的哲学基础和分析要素等，但都缺乏实例分析（尤其是定量层面的

① 肖巍、钱箭星：《“气候变化”：从科学到政治》，载《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6期，第91页。

② 谢婷婷：《行为体策略与规范传播——以美国退出〈京都议定书〉为例》，载《当代亚太》2011年第5期，第109页。

③ 刘永涛：《语言与国际关系：拓展政治分析的新视角》，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1年第7期，第53页。

④ 孙吉胜：《语言、身份与国际秩序：后建构主义理论研究》，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年第5期，第26~36页；孙吉胜：《话语、身份与对外政策——语言与国际关系的后结构主义》，载《国际政治研究》2008年第3期，第41~57页。

⑤ 刘永涛：《语言、身份建构和美国对外政策话语中的“邪恶论”》，载《国际观察》2005年第5期，第31~38页；尤泽顺：《话语、身份建构与中国东盟关系：〈人民日报〉新闻标题分析》，载《东南学术》2011年第5期，第240~248页。

实例分析)；同时，相关研究多集中在某一主导话语（如美国的霸权话语）如何建构、产生或定义社会现实，鲜有对两个或以上的行为体进行对比分析。

本文从隐喻这一角度切入，结合语料库方法，对比英、加、中三国在气候外交中的隐喻使用情况和身份构建。按照建构主义的观点，气候谈判可以看成是一个共有知识建构的过程，共有知识建构行为体的身份和利益，进而影响未来国际气候制度的安排及其演进。<sup>①</sup> 基于行为体不是完全理性的前提假定，本文提出如下假设：隐喻作为话语战略是共有知识的一部分，不仅描述和反映着气候谈判的历史和现实，而且对各利益团体进行身份构建，从而服务于各自的立场。

### （一）身份构建

身份是建构主义学派的核心概念。温特（Alexander Went）认为，身份是社会建构的结果，不仅要传统的物质权力和利益来考虑国际关系，还必须考虑身份在这一过程中的影响。<sup>②</sup> 在国际舞台上，身份认同代表着国家或群体组织在国际社会体系中空间和地位的坐标，并通过界定自我、区分他者，维持和推动国际社会既有的权力关系。身份的构建很大程度上是通过与他者的互动实现的，具有关系性、话语性、政治性和社会性等特征，通过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差异建构出一种“自我—他者关系”。<sup>③</sup> 萨义德（Edward Said）因此指出：“自我身份的建构牵涉到与自己相反的‘他者’身份的建构，而且总是牵涉对与‘我们’不同的特质的不断阐释和再阐释。”<sup>④</sup> 总的来说，人们对自我的定位是相对积极的，对他者的定位则是相对消极的。<sup>⑤</sup>

### （二）意识形态方阵

范迪克（van Dijk）认为，在意识形态话语中，可根据利益需要把人群分为“我们群体”和“他们群体”，并通过意识形态方阵（ideological

① 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② 同上。

③ Lene Hansen, *Security as Practice: Discourse Analysis and the Bosnian War*, New York: Routledge, 2006, p. 12.

④ 爱德华·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426~427页。

⑤ Stuart Hall, "The Spectacle of the Other", in M. Wetherell, S. Taylor and S. J. Yates, eds., *Discourse Theory and Practice: A Reader*, London: SAGE Press, 2001, pp. 324-344.

square) 表现出来, 反应了社会话语中的二元对立。<sup>①</sup> 奥科塔尔 (Lutfiye Oktar) 进一步将其分为以下四个维度:<sup>②</sup>

①表达或强调“我们群体”积极的信息 (express/emphasize information that is “positive” about us);

②压制或淡化“我们群体”消极的信息 (suppress/de-emphasize information that is “negative” about us);

③压制或淡化“他们群体”积极的信息 (suppress/de-emphasize information that is “positive” about them);

④表达或强调“他们群体”消极的信息 (express/emphasize information that is “negative” about them)。

意识形态方阵通过强调、淡化的双重过程, 将群体内和群体外差别两极化: 即凸显“自我”的好(属性/行动)以及“他者”的不好, 同时缓和“自我”的不好和“他者”的好。(见表1)。

表1 意识形态方阵简表

	积极信息	消极信息
自我	① ↑	② ↓
他者	③ ↓	④ ↑

注: “↑”表示表达或强调, “↓”表示压制或淡化。

### (三) 批评隐喻分析

莱考夫 (Lakoff) 和约翰逊 (Johnson) 提出的概念隐喻理论揭示了作为认知模式的隐喻性语言普遍存在于人类的思维中, 且体现在语言使用的各个方面。其认知机制是将始源域 (source domain) 的图式结构映射到目标域 (target domain), 通过始源域的结构来构建和理解目标域。对概念隐喻进行分析, 既能辨别隐喻之间的相互关系, 也能解释特定语篇的连贯性, 进而能对隐喻的使用动机进行更深层的阐释和说明。<sup>③</sup>

① Teun A. van Dijk, “Discourse and Ideology”, in Teun A. van Dijk, ed., *Discourse Studies: A Multidisciplinary Introduction*, London: SAGE Press, 2011, pp. 379-407.

② Lutfiye Oktar, “The Ideological Organization of Representational Processes in the Presentation of us and them”, *Discourse & Society*, Vol. 12, No. 3, 2001, p. 319.

③ Zoltan Kovecses, *Metaphor: A Practical Introduc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查特里斯—布莱克 (Charteris-Black) 进一步注意到, 在国际舞台上, 各国政要往往选用隐喻表达自己的想法, 以激发人们的情感反应并由此做出价值判断。隐喻反映了作者在特定语境中为达到一定的劝导目的而做出的语言选择, 因此, 他主张从意识形态和修辞方面探讨隐喻的语用特征, 并提出了批评隐喻分析 (Critical Metaphor Analysis) 方法。<sup>①</sup> 该理论主张“用语料库方法识别隐喻, 从语用和认知角度阐释隐喻, 通过对隐喻的话语功能进行分析确定其意识形态和修辞基础。批评隐喻分析是深入研究语言、思维和社会之间关系的一种崭新而有效的补充方法”。<sup>②</sup>

### 三、本文的研究设计

#### (一) 语料选择和收集

气候谈判是一个涉及多方利益的政治战场, 气候外交话语因其复杂性和博弈性而颇具研究价值。本文选取英、加、中这三个典型国家, 分别代表了欧盟、伞形集团和发展中国家的立场: (1) 英国是欧盟中较早开始探索低碳经济的国家, 在气候问题上具有较大话语权, 是欧盟谈判立场的“风向标”。(2) 加拿大曾一度是全球环境治理的积极倡导者, 但近年来却蜕变为“拖后腿者”, 成为第一个退出《京都议定书》的缔约国 (美国的情况有所不同, 2001 年小布什政府宣布不加入该议定书, 因此美国一直都游离于这一国际公约之外)。加拿大的蜕变使得其发言更值得推敲和研究。(3) 中国的崛起使其在外交舞台上拥有更多话语权, 但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 它在全球温室气体排放中的份额、增长趋势也使之面临着更大的压力。

《京都议定书》是近年来气候谈判的重要议题, 本文选取以上三国在该议定书第一承诺期 (2008~2012 年) 期间的 24 篇气候大会发言稿 (下载自联合国和三国政府的官方网站), 制成小型语料库。在语料统计中, 首次单独出现的词形被称为类符 (type), 同一个词出现的次数被称为该词的形符 (token); 类符数是语料中一共有多少个不同的词形, 形符数则是语料中共

---

<sup>①</sup> Jonathan Charteris-Black, *Corpus Approaches to Critical Metaphor Analysi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4.

<sup>②</sup> 纪玉华、陈燕:《批评话语分析的新方法: 批评隐喻分析》, 载《厦门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 年第 6 期, 第 42 页。

有多少个词。三国发言稿的类符数、形符数统计如下：

表 2 三方发言稿类符数、形符数

	英国	加拿大	中国
类符数	1232	999	1082
形符数	5236	4850	5267

## (二) 研究步骤

语料分析借助 AntConc 3.2.4 软件进行，具体步骤如下：(1) 凭借先验知识以及对其中 3 篇发言稿的抽样分析，大致预测语料中可能存在何种隐喻；结合相关学者的研究，<sup>①</sup> 对这些潜在隐喻的始源域关键词进行列表，并采用词形还原法 (lemmatization) 将隐喻关键词的各种形式考虑在内，以免遗漏（例如，战争类隐喻关键词 fight 的不同词形 fights、fighting、fought、fighter 等都归到同一词根中进行频率统计）。(2) 使用软件的自动生成词表功能，选取有可能激活潜在隐喻的高频词进行隐喻确认。(3) 以上两方面的数据汇总后，以隐喻关键词为类符，隐喻关键词的数目为类符数，各类隐喻关键词出现的总次数为形符数，在 AntConc 中进行频率统计，并结合语境进行人工核实，剔除非隐喻性表达。

在衡量隐喻的使用频率方面，查特里斯—布莱克提出“总鸣值” (resonance) 这一概念，它等于“隐喻关键词类符数”和“隐喻关键词形符数”的乘积，即  $\text{resonance} = \sum \text{type} * \sum \text{token}$ 。<sup>②</sup> 根据总鸣值统计，三方代表主要涉及以下五类概念隐喻：

- (1) 气候谈判是一次漫长艰难的旅途
- (2) 气候谈判是一场战争
- (3) 气候谈判是建筑的过程
- (4) 气候变化使地球生病
- (5) 气候谈判是生长的植物

<sup>①</sup> 朱炜：《语料库语言学和语篇中隐喻的识别》，载《外语电化教学》2010年第136期，第48~52页；孙亚：《基于语料库工具 Wmatrix 的隐喻研究》，载《外语教学》2012年第3期，第7~11页；Veronika Koller, “Of Critical Importance: Using Electronic Text Corpora to Study Metaphor in Business Media Discourse”, in Anatol Stefanowitsch and Stefan Thomas Gries, eds., *Corpus-based Approaches to Metaphor and Metonymy*,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2007, pp. 237-266.

<sup>②</sup> Jonathan Charteris-Black, *Corpus Approaches to Critical Metaphor Analysis*, p. 89.

本文首先根据总鸣值分析三者对隐喻选择的差异，然后探讨这种差异背后蕴含的政治立场，以及三者如何在隐喻中通过意识形态方阵策略构建“自我—他者”身份。最后分析隐喻—身份构建—政治立场之间的互动关系。

## 四、研究结果与讨论

### （一）隐喻总鸣值对比

根据表 3 和图 1，英、加、中对隐喻的选择既存在共性也存在差异。一方面，排名前三的都是旅途、战争和建筑类隐喻，且无论是类符数、形符数，还是总鸣值百分比，旅途类隐喻在三方发言中都位居首位，即“气候谈判是一次漫长艰难的旅途”获得了各方代表的高度认同。另一方面，三者对隐喻的使用偏好也存在一些差异：（1）英国旅途隐喻总鸣值百分比高达 77.9%，远高于加拿大（61.6%）和中国（53%）；（2）在英国的发言中，战争隐喻（9.6%）略高于建筑隐喻（9.3%），而在其他两国的发言中，建筑隐喻显著高于战争隐喻，尤其是中国，建筑隐喻类符数为 24，总鸣值占 37.4%；（3）三国虽对疾病、植物类隐喻都所涉不多，但相比之下，英国、中国分别在疾病类和植物类隐喻上较为突出，百分比依次是 3.1% 和 2%。

表 3 三方代表隐喻使用情况表

		旅途	战争	建筑	疾病	植物
英 国	隐喻关键词类符数	35	15	13	10	2
	隐喻关键词形符数	87	25	28	12	3
	总鸣值	3045	375	364	120	6
	总鸣值百分比	77.9%	9.6%	9.3%	3.1%	0.2%
加 拿 大	隐喻关键词类符数	26	10	14	2	3
	隐喻关键词形符数	64	35	47	11	3
	总鸣值	1664	350	658	22	9
	总鸣值百分比	61.6%	12.9%	24.3%	0.8%	0.3%
中 国	隐喻关键词类符数	34	10	24	7	6
	隐喻关键词形符数	80	33	80	9	17
	总鸣值	2720	330	1920	63	102
	总鸣值百分比	53%	6.4%	37.4%	1.2%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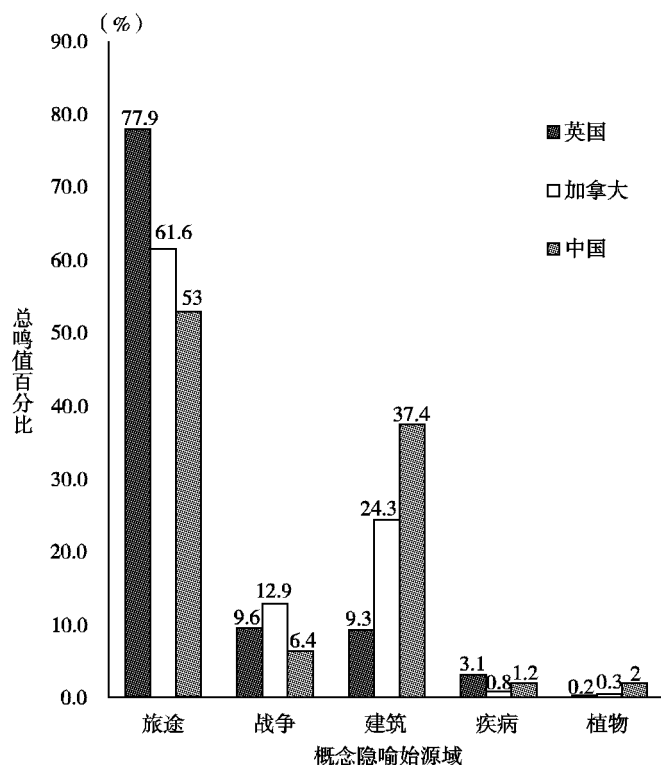


图 1 三方代表隐喻使用情况图

## (二) 隐喻和“自我—他者”身份构建

### 1. 英国的隐喻使用和身份构建

旅途隐喻在英、加、中的发言中均排在首位（见表 3、图 1），这表明气候谈判的长期性、艰苦性得到了各方的认同，从 Bali Action Plan（巴厘行动计划）、EU Roadmap（欧盟路线图）、Durban Package Outcome（德班一揽子决议）和 dual-track mechanism（双轨机制）等术语中也可可见一斑。如表 4 所示，旅途隐喻中，旅者对应的目标域为气候谈判与会国，旅途的行囊喻指《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绿色气候基金等大会议题，旅途的目的地则是经由谈判达成最终协议。

表 4 旅途隐喻的认知投射

始源域	目标域
旅途	气候谈判
旅者	气候谈判与会国
行囊	欧盟路线图、议定书第二承诺期、绿色基金等
目的地	达成一致协定

在英国的发言中，旅途类隐喻所占比重最大（高达 77.9%）。相关例句如（1）～（4）（横线部分为隐喻关键词，下同），重在突出气候谈判需要有统一的方向、方式和同路人，而目前尚有很多问题亟待解决。另外，其发言中出现频率最高的两个旅途隐喻关键词 progress（前进）和 move（移动）（分别出现 11、8 次）均属于行动性词汇，表明气候谈判“路漫漫其修远兮”，各国须鼓足干劲，加快步伐。

（1）And that really is the objective for Copenhagen: to get us moving. To be the signal set that makes us switch track to a low carbon future. And to make sure that everyone is on the train, going in the same direction.（这正是哥本哈根的目的所在：让我们行动起来，发出信号，促使我们转向低碳的轨道，并确保每个人都在列车上，驶向同一个方向。）

（2）Some will be at the front, some at the back. Some will pay more than others. But together we are on board for a new destination.（有些人在前面，有些人在后面，有些人付出更多，但我们终究都是在这辆火车上驶向新的目的地。）

（3）We need to pave the way for the new global deal while delivering more action now.（现在我们需要落实更多的行动，为新的全球协议铺平道路。）

（4）This round of international climate change talks was a modest step forward.（这一轮气候谈判只是向前迈了一小步。）

此外，英国的疾病隐喻居三国之首，如例（5）和例（6），虽然比例不大，但却给人以气候问题亟待解决的紧迫感。“疾病隐喻能激发听众内心的焦虑紧张和不安的情感，促使听众急切想要知道政府会采取什么样的策略或

方案，即疾病隐喻所激发的不安情绪会“说服”听众接受演讲者的观点”。<sup>①</sup>另外，战争隐喻的使用则集中体现了气候谈判是一个博弈的战场，意见不一，有各种利益纠纷，希望各方能做出妥协，如例（7）。确切地说，三方的所有发言稿中，只有英国使用了 compromise（妥协）一词。

（5）Nowhere is this more essential than here in Africa, the continent most vulnerable to climate change.（相比其他地方，在非洲这片最容易受气候影响的大陆上，这一问题更为紧要。）

（6）Imagine a healthier, safer and more sustainable, economically robust world.（试想一个更健康、更安全、更持续、经济更强劲的世界。）

（7）A car crash of a summit is in no one's interest. The answer has to be compromise.（冲突碰撞于各方都无益，因此须作出妥协让步。）

总的来说，相关隐喻的使用体现了表 1 意识形态方阵中的维度①和③，即强调自我积极的信息，淡化他者积极的信息：旅途隐喻表明，气候谈判之路虽充满险阻，但英国是一个具有表率作用的先行者，将谈判的列车推向正确的方向；疾病隐喻道出全球生态的脆弱性，也是对他国节能减排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战争隐喻的使用既隐射了他国在气候治理中消极保守的态度，又突显了欧盟在保护环境方面的贡献。在此，英国的“自我”是指包括英国在内的欧盟国家，“他者”是指以美国为首的伞形集团和以中国为首的发展中国家。

使用隐喻时，英国涉及“自我”和“他者”的比例大致相同，没有特别明显的咄咄逼人之态——过分强调他者消极的信息（即表 1 的维度④）。究其原因在于 2009 年哥本哈根大会上，欧盟由于过度强调自己的立场而失去了他国的支持，甚至被边缘化。<sup>②</sup>会后，欧盟进行了反思并调整对外策略，对发展中国家主要采用“联小”的策略——将中国和印度等定义为发达的发展中国家，联合其他发展中国家一起要求它们承担量化减排责任，并利用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国家的诉求，分而施压，将中印等国的减排与欧盟资金援助承诺相挂钩。<sup>③</sup>

① 吴丹苹、庞继贤：《政治语篇中隐喻的说服功能与话语策略——一项基于语料库的研究》，载《外语与外语教学》2011年第4期，第42页。

② 薄燕、陈志敏：《全球气候变化治理中欧盟领导能力的弱化》，载《国际问题研究》2011年第1期，第42页。

③ 于宏源：《试析全球气候变化谈判格局的新变化》，载《现代国际关系》2012年第6期，第12页。

## □ 当代亚太

长期以来，欧盟在应对全球气候进程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领导作用，主要原因在于：欧盟认为气候变化是具有极大危害的全球性问题，需通过多边途径予以解决；在节能减排的立法、政策、行动和技术方面，欧盟一直处于全球领先水平，其减排成本相对较低。但是当前欧债危机以及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格局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欧盟承担减排责任的积极性。其既因债务危机分身乏术，不想花费过多精力在气候谈判上，但也不想就此放弃全球气候治理的领导权。因此，英国通过隐喻成功地构建了“自我—他者”的身份对立：一方面强化欧盟在气候谈判中的作用，另一方面批评伞形集团和发展中国家对议定书第二承诺期所持的消极保守态度，从而为其谈判立场服务。

### 2. 加拿大的隐喻使用和身份构建

加拿大使用旅途隐喻时 13 次强调气候谈判机制需要 “fair and effective” (公平有效)，从而质疑当前道路的正确性。正因如此，*approach* (途径)、*way* (道路)、*path* (*way*) (路线) 这三个单词在其所有旅途类隐喻关键词中位列前三，分别出现 14、8、7 次；同时，加在提及责任时倾向于使用 *halfway* (在途中)、*underway* (起步的，进行中的) 等较保守的词汇 (如例 (8))。例 (9) 中加拿大表示，只让发达国家签署《京都议定书》这条道路本身是不正确的；例 (10) 划船的比喻出现了 3 个 *everyone* (每个人)，喻指只有制定一个涵盖所有二氧化碳排放大国的议定书才能真正扬帆远航。此外，加虽反复提及它在过去旅途中承担的责任，却基本没有就接下来的旅途做出承诺，进而为自己退出议定书埋下了伏笔。

(8) Canada is halfway to achieving our national effort to meet our Copenhagen target. (加拿大正在举国努力、实现哥本哈根目标的半路上。)

(9) It is an approach that does not lead to more comprehensive engagement of key parties who need to be actively part of a global agreement. (二氧化碳主要排放国需要积极成为全球减排协议的一部分，而当前这条路无法获得它们更广泛的减排承诺。)

(10) Success in the fight against global warming will only come with everyone aboard, everyone with an oar in the water and everyone rowing together. (只有每个人都上船，每个人都拿起桨一起划船，才能在抗击全球变暖的战争中获胜。)

(11) This is a target that is aligned with the United States, our closest

neighbour and most important trading partner. (这个目标与我们的盟友、近邻、最重要的贸易伙伴美国相一致。)

加拿大战争隐喻总鸣值比例为 12.9%，分别高出英国和中国 3.3%、6.5%，如例 (10)、(11)。其中 align (联盟) 一词共出现 6 次，易让人联想到战争中国家之间进行联盟以合力对抗共同的敌人的场景。同时，为缓和国际谴责，加拿大在构建身份时紧紧地将自己与美国联系在一起，使用 “our continental partner” (我们的陆邻伙伴)、“our closest neighbour” (我们最亲密的邻国) 等词，似有拿美国当挡箭牌之嫌。

在加拿大的定位中，“自我”是指以美国为首的伞形集团，“他者”是指发展中国家，其发言对意识形态方阵的 4 个维度都有涉及。淡化自我的消极信息和他者的积极信息主要表现在：认为只让发达国家签署《京都议定书》的旅途方向不正确，直接表现为：不对接下来的旅程做承诺，不提将来的责任，且紧紧地将自己的立场与美国绑定；淡化发展中国家当前面临促发展、脱贫困的重任及它们为全球气候已做的努力。突显自我的积极信息和他者的消极信息表现在：使用旅途隐喻时，将自我定义为旅途的“推动力”，表示加虽不认可议定书，但在过去的旅途中已尽了节能减排的国际道义；同时将发展中国家定位为“障碍力”，突显其当下二氧化碳排放总量。

值得注意的是，加拿大发言里意识形态方阵③、④的比重大于①和②，即“他者”是其发言的重点，即对他者的关注度越高、对他者的追问和期望越高，越体现了对自身利益的执着。这与加气候外交中的“抓大”策略有关——将所有排放大国都纳入同一个减排框架，主张以小多边主义和大国减排取代发达国家减排，否定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从而否定京都议定书模式的谈判框架。<sup>①</sup>

加拿大曾是引领全球气候治理的典范，然而近年来却变得消极自保：一方面是因为它拥有大量油砂资源，是少数几个较为依赖化石能源出口的发达国家之一；另一方面，美加墨自由贸易区中，墨西哥无需承担有约束力的减排承诺，美国也没有参与后京都气候机制，加拿大参与减排会损害其经济竞争力。<sup>②</sup> 作为首个退出《京都议定书》的国家，加拿大在发言中成功地通过

① 于宏源：《试析全球气候变化谈判格局的新变化》，第 11~12 页。

② 谢来辉：《全球环境治理“领导者”的蜕变：加拿大的案例》，载《当代亚太》2012 年第 1 期，第 119~139 页。

隐喻构建了“自我—他者”的对立，将矛头指向中印等发展中大国。事实上，发达国家从未停止纠缠发展中国家承担减排责任的问题，<sup>①</sup> ③但加拿大以中、美等国未加入《京都议定书》为由拒绝签署第二承诺期，把责任推给其盟友美国。

### 3. 中国的隐喻使用和身份构建

同样，中国代表使用频率最高的也是旅途隐喻（53%），相关关键词有 progress（前进）、milestone（里程碑）、deviate（脱轨、偏离）等，如例（12）～（14）。中国一方面勾勒出应对全球气候变暖的方向，唤起人们对前景的憧憬，另一方面注重激发“携手并进”的认同感，强调会继续承担旅途中与自己国情相适应的行囊重量。此外，中方在植物隐喻使用上也较突出，如例（14）中的 fruitless（一无收成）和例（15）中的 core（核心）。该类隐喻具有积极的联想义，能“使听众感到种植、生长和收获的关系性以及体制改革、经济发展的渐进性和可预测性”。<sup>②</sup>

(12) We should adopt a down-to-earth approach and work towards steady progress. (我们需要脚踏实地、稳步推进。)

(13) We will make the Copenhagen Conference a new milestone in the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on climate change. (我们要使哥本哈根大会成为国际社会合作应对气候变化新的里程碑。)

表 5 建筑隐喻的认知投射

始源域	目标域
建筑	气候谈判
建筑师	气候谈判与会国
框架	谈判机制
奠基石	京都议定书、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等

(14) Any attempts to deviate from, breach or re-define the Convention, or to deny the Kyoto Protocol, or to merge the Convention process with the Kyoto Protocol process...will ultimately lead to a fruitless Copenhagen Con-

① 宫笠俐：《日本在国际气候谈判中的立场转变及原因分析》，载《当代亚太》2012年第1期，第154页。

② 纪玉华、陈燕：《批评话语分析的新方法：批评隐喻分析》，第47页。

ference. (任何偏离、违背或重新解释公约、否定京都议定书或者将公约进程与议定书进程合二为一的行径……终将导致哥本哈根会议一无所获。)

(15) The principle of “common but differentiated responsibilities” represents the core and bedrock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on climate change. (“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是国际合作应对气候变化的核心和基石。)

建筑类隐喻在气候谈判中颇为常见，如一些气候术语的命名：Durban Platform (德班平台)、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Doha Climate Gateway (多哈气候通关) 等。中国代表在使用建筑隐喻上可谓一枝独秀 (占 37.4%，参见表 3 和图 1)，其认知投射见表 5，相关例句如 (16) ~ (18)。建筑隐喻具有积极的联想义，表明当下的每一份努力都是在为大厦添砖加瓦。通过该隐喻，中国既强调打好基础、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和《京都议定书》的重要性，又充分肯定了人们共聚德班、保护气候的意义和价值，唤起人们的努力和耐心。

(16) The work of the AWG-KP and AWG-LCA, which will...lay a solid foundation for negotiations under the Durban Platform. (议定书特设工作组和长期合作行动特设工作组的工作将……为德班平台下的谈判奠定坚实基础。)

(17) We strongly believe that the Kyoto Protocol remains the key component and cornerstone of the international climate regime. (我们坚信，京都议定书仍然是国际气候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基石。)

(18) China will, as always, play a constructive role and work tirelessly with all parties in order to achieve a positive outcome at the Durban Conference. (中国将一如既往地发挥积极建设性作用，与各方一道，共同为德班会议圆满成功做出不懈努力。)

从意识形态方阵角度来说，相关隐喻主要涉及了① (凸显自我的积极信息) 和② (淡化自我的消极信息)。在此，中国构建的“自我”是指发展中国家，“他者”则是指发达国家。“他者”并非是主旋律，更多的是对自身的总结和检视。凸显自我的积极信息体现在通过旅途隐喻，注重激发“携手并进”的认同感；通过建筑、植物隐喻强调自我为应对全球气候变暖所作的努力，扮演发展中国家利益的呼吁者和维护者，唤起人们保护气候的积极性。

淡化自我的消极信息则是通过突出中国当前面临严峻的发展任务来实现的。

在京都进程中，中国可谓是个“谨慎而积极的参与者”，<sup>①</sup>主要表现在拒绝承担强制性的减排义务上，这与中国国情有关：（1）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人口众多；（2）当前正处于经济高速增长的工业化阶段，能源结构以煤炭为主；（3）能源技术落后，通过调整能源结构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的潜力有限。同时，“欧美发达国家虽然在承担量化减排目标问题上存在分歧，但在以下三个问题上的态度和立场趋同：弱化发达国家的量化减排义务；要求中国承担量化减排义务；在对发展中国家进行资金和技术转让问题上采取拖延态度”。<sup>②</sup>加之当前温室气体排放格局出现了变化，发展中国家内部的排放量差异性扩大，这些使得“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受到质疑，发展中国家内部也开始出现分化。因此，中国代表发言时非常强调“自我”这个阵营以激发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认同，且一再提及“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认为发达国家应当率先减排，并给予发展中国家资金和技术等方面的援助。

## 五、结 论

通过上述分析，英、加、中在隐喻的选择和使用上主要有以下区别。一方面，使用同类隐喻，但由于政治需要不同，突显的方面不尽相同。例如，尽管三方都使用了大量旅途类隐喻，但表达的侧重点却截然不同：英国使用较多诸如 progress、move 等行动类隐喻关键词，突出气候之旅会遇到困难，需要积极克服，没有回头路可走，从而强调“自我”的先锋作用和“他者”的消极被动；中国的旅途隐喻更多是在鼓舞士气，在发展中国家（即“自我”）中激发“携手并进、继往开来”的认同感；加拿大多次使用 approach, way, path (way) 等隐喻关键词，质疑当前道路的合理性，并将“自我”定位为旅途的推动力，“他者”为旅途的障碍力。

另一方面，采用不同或具有特殊联想义的隐喻进行身份构建，突显“自我”的作用。例如，中国在建筑隐喻和植物隐喻上较为突出。这两者均具有积极向上的意义：建筑隐喻强调气候谈判机制的长期性、合理性和稳固性；

---

<sup>①</sup> 薄燕：《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上的中美欧三边关系》，载《现代国际关系》2010年第4期，第16页。

<sup>②</sup> 同上，第18页。



植物隐喻使听众感到气候治理的渐进性、可预测性和收获性。通过这些隐喻，中国将“自我”塑造成一个气候谈判积极的缔造者和播种者。

隐喻使用的差别呈现出不同的意识形态方阵，进而构建不同的“自我—他者”身份，以服务于各自的政治立场。同时，政治立场对隐喻的选择与运用也有制约作用。例如，中英两国在谈及气候谈判机制的公平性时，两者的立足点截然不同：前者将隐喻的使用放置在“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下，认为发达国家应当正视其历史责任和人均排放高的现实，率先大幅减排；后者只强调“共同的责任”，基本不提“区别的责任”，从而突显了欧盟在气候谈判中的作用，并对发展中国家进行了隐射。

总得来说，英、加、中三国对隐喻的选择和使用与其政治立场密切相关，而隐喻又通过意识形态方阵强化“自我—他者”的身份对立，反过来为政治立场服务：(1) 英国的“自我”是指包括英国在内的欧盟国家，“他者”则是以美国为首的伞形集团和以中国为首的发展中国家，“自我”和“他者”的叙述比重相当。相关隐喻的使用突显了欧盟在应对气候变化中所扮演的角色，批评其他国家对《京都议定书》消极保守的态度，突显“共同的责任”。(2) 加拿大构建的“自我”是指伞形集团，“他者”则是指发展中国家。隐喻的使用突出其之前为保护气候所做的贡献，淡化自身退出议定书的行为，并将矛头指向发展中国家，对“他者”的要求和评价是该国发言的主要基调。(3) 中国代表的发言里，“自我”是指发展中国家，“他者”则是指发达国家。使用隐喻时更多的是对“自我”的检视，并运用诸如植物、建筑等具有积极联想义的比喻，强化与发展中国家的认同，凸显气候保护中“区别的责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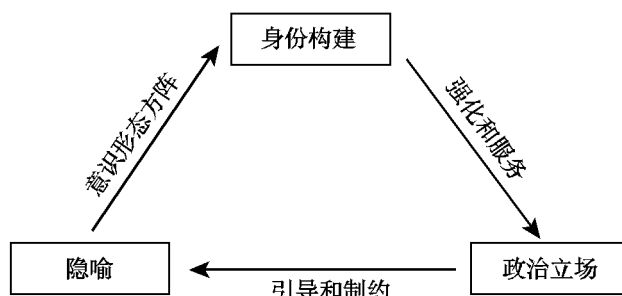


图2 隐喻—身份构建—政治立场互动图

综上所述，本文在对原有理论进行修正和整合的基础上，提出了“隐喻—身份构建—政治立场”的互动框架，以展示三者的动态互动关系（见图2）。由图2可知，各方对隐喻的选择和使用受政治立场的引导和制约，出于不同的政治需要而采用迥异的隐喻或突显不同的重点，并在该过程中遵循意识形态方阵策略进行身份构建，强化“自我—他者”的对立。这种对立是政治权力分配体系中的重要部分，因此反过来强化了现有意识形态和气候政治权力的结构。这与本文的假设相符，即在气候外交发言中，各方代表对隐喻的使用不但描述和反映着气候谈判的历史和现实，还能够对“自我—他者”定位进行强化，从而服务于各自的立场。这也从另一个角度印证了前人的研究——隐喻是思维和行动的问题，是一种意义生产的再造形式，其使用受到意识形态和社会权力的引导和制约，反过来也可以为之服务，对社会现实的建构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 六、结 语

语言是国家软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际关系实践的一部分，语言战略及策略可以对国家之间的认同关系产生重要影响。本文研究表明，隐喻的使用能够促进气候外交中“自我—他者”身份的构建，对其进行的分析揭示了各利益团体如何看待气候谈判的历史、现状以及未来的政治选择。因此，我们一方面要关注对外政策话语如何叙述外交“事件”和“真相”，通过外交话语中的隐喻推断他国对外政策的变化，另一方面也要注重中国战略性外交话语的建构来应对外交谈判的需要，以获得国际社会的认同。另外，本文是对“隐喻—身份构建—政治立场”互动关系的初步探讨，因此选取了阵营分化较明显的气候外交进行分析，今后可进一步将批评隐喻分析方法应用于发达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对气候变化问题本身、对国际规范等根本问题的认识和相互建构，这样做可能更有启发性；同时，本文是对不同国家的横向对比，今后相关研究可从纵向角度切入，例如，对欧盟不同时期的隐喻使用进行分析，以挖掘其气候战略的变化与调整。